

些人到各县不仅积极从事扶植地方傀儡政府的阴谋，并且在关东军指使下，组织地主汉奸的反动武装，镇压人民群众，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。这些所谓的“指导员”，后来大部分摇身一变，成为各县的伪县公署的“参事官”（即后来的副县长），控制各县的一切大权。

日本侵略者不仅吹捧于冲汉的八条卖国主义“政见”，又拟制了“自治指导部”第一号布告，用于冲汉的名义发表，把它作为“自治指导部”的基本精神。布告满篇都是荒谬的言论，但却被美化为有“道义立国的精神”。

日本侵略者不但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攫夺县一级政权的工具，同时也是制造伪满洲国的一个特设机构。凡是有关“满蒙独立运动”的宣传，以及各县所谓“促进”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，都是由这个机关盗用地方的“民意”，加以伪造，进行欺骗性的宣传，企图借东北“自治”的名义，蒙蔽世界公众耳目。

二、挟持溥仪

1 溥伟一度登场

日本侵略者先从省到县拼凑傀儡政权，然后又为制造傀儡政权搜罗班底。他们在决定把溥仪弄到东北之前，还有过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的设想。但是，他们认为张作相既是张学良的亲信，又被认为“昏庸无能，不孚众望，对统辖东北的整个局势，难以胜任”，因而放弃了改用张作相的主张。另外据传，日本侵略者还曾一度想要利用段祺瑞或张宗昌，组织北方傀儡政权，又一

度要溥伟出马，搞“明光帝国”。在这些被物色的傀儡中间，溥伟在大连，溥仪在天津，早就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豢养，因此曾先后被拉来充当傀儡，扮演登场。

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日本侵略者真是妙想天开，把前清的废王（即恭亲王）溥伟从大连弄到沈阳，代替 阙 朝 玺 就任“四民维持会”会长，表面上以“救济”为名义，暗中却演傀儡戏，为制造伪国政权大造舆论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溥伟在日本侵略者的“保护”下，竟率其亲族旧臣，祭祀沈阳北陵，强迫沈阳各市民团体参加，并找喇嘛数百人，在陵前诵经，日方赠送的花圈，已隐约含有复辟阴谋的意思。果然，溥伟在祭文中竟假借民意宣扬复辟的谬论说：“四省之民，怀彼遐方可还，应仰遗绩于往时，尽诚意于当世，永享和平安乐之福祉。”^① 然后又在陵前宣读誓词，胡说“此际仰仗祖宗灵威，及日本正义，推翻盘踞廿年之仇敌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，恢复祖宗之基业”。^② 溥伟竟俨然以未来的帝王自居，要恢复被中国人民推翻的清朝反动统治。

溥伟早就有复辟的思想，他曾到天津见到溥仪说：“有溥伟在，大清就一定不会亡！”^③ 他在就任“四民维持会”会长时，也曾叫嚷：“满人治满”、“永远与日本人合作”，妄图借日本帝国主义力量复辟。辛亥革命期间，他与良弼、铁良等组成了宗社党，其目的是挽救清朝的灭亡，反对清帝退位，反对议和。后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，宣统帝溥仪被迫退位，宗社党中一些主要分子并不死心，分别投靠了帝国主义，企图借外力来复辟，可见溥伟是满清皇族中最顽固的反动分子。这时，一小撮复辟派象苍蝇一样围

① 陈觉：《国难痛史资料》，第3卷，第51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51页。

③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31页。

绕在溥伟的周围，阴谋策划建立“明光帝国”。

十月三十日，在沈阳大和旅馆，召开准备会议，除一般旧日王孙和热衷于帝制的家伙参加外，代表日方的有土肥原等十人出席。究竟怎样建立“明光帝国”？政体是采取共和制，还是君主制？都需要研究决定。在讨论谁当“君主”时，溥伟不赞成推举溥仪上台，实际上是想自己登上皇帝宝座，但金梁^①等坚决主张：“非溥仪出头，弗能号召”，^②争论得很激烈，没有结论。十一月十二日前后，又召集全省各县镇商会会长到沈阳开会，准备签字公推溥伟为皇帝，打算悬挂龙旗，与中国国民政府脱离关系。但是，由于各商联合会许多重要人员进行抵制，结果宣告破产。

后来，伪辽宁省政府日本顾问金井，又假借溥伟名义，纠集汉奸在沈阳南满站公记饭店，举行建立伪国的座谈会，日方出席的有金井、森岛（领事）、河相（外事科长）、松井（大佐）、矢崎（少佐）、都甲文雄等；溥伟临时拉拢一些流氓无赖，冒充各团体代表参加。日本侵略者的目的，是利用这次座谈会，作为制造伪国的宣传资料。因为关东军早已决定，利用清朝废帝溥仪，作为伪满洲国的傀儡，中间抬出溥伟只不过是一个客串傀儡演员，起一个过渡作用罢了。所以，当溥仪被挟持到沈阳时，溥伟一见风头不对，赶紧跑回大连。溥伟被利用演傀儡戏，时间很短，即被踢到一边。

2 溥仪长期处在日本的羽翼之下

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溥仪被迫退位。起先，根据“清室优待条件”，他在紫禁城内还过着保留皇帝尊号的

^① 参见前述：金梁是前清内务府大臣，“辽宁省地方维持会”的会员。

^② 陈觉：《国难痛史资料》，第3卷，第82页。

小朝廷生活。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，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紫禁城后，先是躲到他父亲的北府里，后来经过卖国贼罗振玉的暗中活动，又逃入日本公使馆，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。日本公使芳泽利用这个机会，对溥仪进行了殷勤照料，为他准备了“大清皇帝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，接受清朝遗老遗少们的朝贺。这种公开包庇和拉拢溥仪的阴谋活动，激起社会舆论的义愤。正象后来溥仪自己写的：“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来的有‘别馆珍闻’的讽刺小品，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；有对我的善意忠告，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。今天看来，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，也不会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样。记得有几篇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，现在我把它找出来了。这是一份登在《京报》上的‘新闻编译社’的消息，其中有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，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吻合，简直令我十分惊讶：

其极大黑幕，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，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；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，与民国脱离，受某国之保护，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。

这个文章后面又说：‘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，皆有人故意恫吓，入其圈套，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’，‘其目前之优待，供应一切，情愿破钞，侍从人员，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，不知皆已受其牢宠，为将来之机械也’。这些实在话，在当时我的眼里，都一律成了诬蔑、陷害，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。”^①来自社会上的忠告和抗议，反使溥仪感到不安，于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又

^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192—193页。

被日本侵略者挟持到天津日本租借地豢养起来。当溥仪到达天津车站时，受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日本驻军官兵们的迎接。

溥仪以封建专制余孽“亡国皇帝”的资格，居住在日本租界地里。他在天津一连住了七年，每天所接触的，不是日本官吏和浪人，就是清朝余孽。据他自己说：“大致可分为这几派：起初把希望放在优待条件方面，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，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‘旧臣’，可以称之为‘还宫派’；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（主要是日本）援助上的，是以罗振玉为首，其中有遗老遗少，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，按当时的说法，可以称之为‘联日’或‘出洋’派；把希望放在联络、收买军阀方面，即所谓‘用武人’一派，这派人物颇复杂，有前清遗老，也有民国的政客，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。”^①这几派的最终目的，其实并不矛盾，都是一致希望复辟。溥仪在年青时代长久被这种恶劣环境所包围，几乎与外界隔绝，这就助长了他复辟的野心。

溥仪在天津的七年间，拉拢过一切他想拉拢的军阀，想为他的复辟效劳。他写道：“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，张作霖向我磕过头，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。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，也是我拉拢最力、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。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。”但是，溥仪的这种活动，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，他每逢外出，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，名义上保护，实际上是监视，不让他进入中国管辖地区，禁止他和奉系军阀们接触，以便把溥仪垄断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手里。

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，在溥仪身边的就有这样一种卖国论调：“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，日本禁关东与党军（指张学良与国民党）协和，力足取之，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，非得皇上正位

^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199页。

则举措难施。”^①这虽然是奉承溥仪的话，但在实际上，日本侵略中国，如果不找一个傀儡作为独立的遮羞布，也难以实现它的殖民统治。因此，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这样控制和“保护”溥仪，也是为以后能利用他充当傀儡。而溥仪等复辟派也想“借用日本之力”，来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。二者就是这样，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了。

日本侵略者为了拉拢、控制溥仪，是很花费一些功夫的，对他的要求尽量满足。溥仪要派他的弟弟溥杰和他的三妹夫润麒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，天津日本总领事特意推荐了一个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当家庭教师，教他们学日文。更用一些细微的小动作，来培植溥仪的亲日感情，鼓动他的复辟野心。如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曾邀请溥仪参观一所日本侨民小学，小学生手持纸旗，夹道向溥仪欢呼“万岁”，以取得这个废帝的好感；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会见溥仪说：“请宣统帝放心，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。”^②溥仪听了大为得意；每逢新年或溥仪的寿辰，日本领事官和日军将校们必定到溥仪这边来祝贺，把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废帝当做一个皇帝看待；到了日本天长节，还邀溥仪去参加阅兵典礼，植田谦吉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向溥仪行致敬礼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多年来经常派参谋们给溥仪讲时事，其中还包括象吉冈安置^③这样的人，主要是讲中国内战形势，说“中国的混乱，根本在于群龙无首，没有了皇帝”。并胡说什么中国的“民心”唯有溥仪“才能收拾”。^④日本侵略者就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19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34页。

③ 吉冈安直后来在伪满时，当过溥仪的“御用挂”，监视溥仪的一切活动（详见第三章）。

④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35页。

是用这种手法，笼络溥仪的心，使溥仪完全信赖日本帝国主义，把它作为自己复辟的一个外援力量。

日本驻军司令部为了控制溥仪，在天津专设了一个特务机构名叫“三野公馆”，这个秘密机构，也是拉拢汉奸走狗们的场所，专为罗振玉、荣源、谢介石等卖国贼预备了鸦片、女人等等^①。在日本人的鼓动下，汉奸们一个个不甘落后，争相卖力。汉奸郑孝胥也步罗振玉的后尘，向日本侵略者献媚，盼望他们加速对中国的干涉。他甚至直接去东京找日本上层人物。陪他去的，“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颇有‘路子’的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。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，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”。^②后来，郑孝胥对溥仪说，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溥仪的复辟表示了“关心”和“同情”。郑孝胥在日本，被当做溥仪的代表，受到了各种“热心于恢复清朝”的人物接待。除了象高田丰树（前天津驻屯司令官）、有田八郎（做过天津总领事）等外，还有日本上层的大人物，如近卫文麿、宇垣一成、米内光政、平沼骐一郎、铃木贯太郎、南次郎等等。另外，还有一些著名的政客、财阀，也都与郑见了面。郑孝胥虽然想依靠日本复辟，但他一有机会，便贩卖他的所谓“门户开放”、“机会均等”的货色。这就是说，他想敞开中国的大门，不只是放进一个强盗，而想要放进一帮强盗，实行所谓“国际共管”，他想充当一帮强盗的大管家。后来，就是因为他这种谬论激怒了日本侵略者，结果连他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。

3 溥仪被秘密挟持到东北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的两个月，在日本学习的溥杰，带回来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41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48页。

了吉冈安直^①的口信说：中国东北“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。……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，他不是没有希望的！”七月十日，溥杰回到了天津，把这个秘密消息告诉了溥仪。正当中国东北局势日趋紧张，传来了这样的消息，对溥仪来说，无疑是一个信号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第二天晚上，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立即主张“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”的傀儡政权，这绝不是偶然想出来的，实际上是日本军方早就密谋过的。关东军参谋部按照这个指示，除了致电天津日军司令官，委托“保护”溥仪以外，又特派上角利一和罗振玉到天津去接溥仪^②。

这时，溥仪每天也在做“重登大宝”的复辟美梦，并派刘骥业、佟济煦到东北进行联络，探听各方面的情况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午，驻天津日本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到静园，说司令官香椎浩平叫溥仪“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”。当溥仪一到司令部的客厅，就看见“有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，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，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”。香椎指着这个陌生的人介绍说：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派来的，名叫上角利一。罗振玉把汉奸熙洽的信交给溥仪，信中诱劝溥仪“勿失时机，立即到‘祖宗发祥地’主持大计”。信中还说：只要溥仪一回到沈阳，熙洽在吉林“首先宣布复辟”。等溥仪看完了信，罗振玉又进一步用谎言煽动说：东北三千万“子民”盼溥仪回去，关东军愿意叫溥仪去“复位”，特意派了上角利一来接溥仪^③。实际上，这是关东军通过熙洽和罗振玉的嘴表示要起用溥仪，把他诱骗到东北去。溥仪听完了这些话后，心中犹豫未定，

① 吉冈安直当时任日本鹿儿岛驻军联队的大队长。

② 见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99页。

③ 见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66—267页。

于是说：等我回去考虑一下，再作答复。这时，香椎催促说：“天津的治安情况不好”，希望溥仪“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佐的意见，动身到东北去”。^①

据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所载，当溥仪回到静园后，陈宝琛、胡嗣瑗、陈曾寿等都说：“东北的局势变化、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，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，目前还未见分晓，至少要等刘骥业探得真象之后，才能决定行止”。^②郑孝胥虽然表示赞同去东北，但他又说不要着急，“等佟济煦回来之后，更为妥贴”。^③陈曾寿唯恐溥仪变了主意，忙给溥仪写了一个奏折，其中谈道：“窃闻凡事不密则害成。……若果大连之行，必将中外喧腾，指斥无所不至，则日本纵有此心，亦将阻而变计。彼时进既不能，退又不可，其为危险岂堪设想。……如其怀有利用欺诱之意，则朝鲜复辙具在，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。”^④这个奏折反映了陈宝琛等“还宫派”错综复杂的复辟思想，既想依靠日本复辟，又对日本所为不大托底。

这伙“还宫派”，终年累月，不离溥仪左右，策划复辟，但事到临头，又怕被“利用欺诱”，担心溥仪象朝鲜国王一样被害死；但他们认为“应付之计，宜与明定约言，确有保障而后可往。大抵路、矿、商务之利，可以酌量许让。用人行政之权，必须完全自主。对外可与结攻守之盟，内政必不容丝毫之干予”。^⑤说穿了，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独揽大权，保证个人官禄权势，因此主张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在我，至于国家主权，什么路、矿、商务之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68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69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70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271—272页。

⑤ 同上书。

利以及其他经济权利等，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。这伙不惜出卖主权的“还官派”，为个人利害得失，左顾右盼，岂不知关东军早已准备妥了一套殖民地统治方案，决定了溥仪去充当傀儡的命运！

但是，当时由于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、锦州和黑龙江省还没有沦陷，以及国际舆论正在强烈地谴责日本，迫使日本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，因此日本军政两界在挟持溥仪、炮制伪政权的步骤和方法上，确有意见分歧，这在日本驻军司令部与驻天津领事馆之间反映出来了。就在溥仪会见罗振玉的第二天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后藤便找上了门，劝告溥仪“不要离开天津”。①溥仪左右的“还官派”和郑孝胥也天天劝阻，但另一面，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，却一再说：“日本军方决心支持”溥仪，“最好立刻动身出行”②。碰巧这时，佟济煦和刘骥业都先后从东北探听消息回来，前者说袁金铠等遗老认为时机已到，不必迟疑，后者说见到了板垣和金梁，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是关东军派来的。

这时，天津新闻界已经把溥仪去日军司令部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社会上，甚至说：溥仪“已乘轮到了东北”。与此同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谣言，说中国人要对溥仪有不利的举动。因此，溥仪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，立即派郑孝胥的儿子郑垂去问日本总领事桑岛，想先到旅顺暂住怎么样？桑岛表示：“到旅顺去也不必要”。桑岛这一态度不是自作主张，而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训令，不让溥仪随便走动，要进行“严密监视”。③恰在这时，第二次去东北的刘骥业来了信，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真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73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73—247页。

③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：《秘录土肥原贤二》，第203页。芙蓉书房1972年版。

正意图：“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，俟三省团结稳固，当由内田（满铁总裁）请上临幸”。^①这样，溥仪只得待命等候。

但板垣等人仍在积极活动，又先后派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金梁来到天津，劝诱溥仪。^②然后，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又被秘密派到天津，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。

据郑孝胥日记的记载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日，日军驻天津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到静园来说：“土肥原至天津，与司令部秘商，谓宜速往”。^③于是，在十一月三日夜间，溥仪会见了土肥原。土肥原是靠侵略中国起家的，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写道：

“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，只是‘诚心诚意地，要帮助满洲人民，建立自己的新国家’，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，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，亲自领导这个国家；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，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；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，我一切可以自主。

他的诚恳的语调，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、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。陈宝琛所担心的——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，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——那两个问题，我认为更不存在了。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：‘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！’

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，我问道：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75—276页。

② 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99页。

③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77—278页。

‘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？’

‘我已经说过，是独立自主的，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’。

‘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，还是帝制？是不是帝国？’

‘这些问题，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’。

‘不’我坚持地说，‘如果是复辟，我就去，不然的话我就不去’。

他微笑了，声调不变地说：

‘当然是帝国，这是没有问题的’。

‘如果是帝国，我可以去！’我表示了满意。

‘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，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满洲。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。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。’”^①

土肥原谈完以后走了。吉田告诉溥仪，“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；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，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。我当时决定，除了郑孝胥之外，再不找别人商量”。^②

但是，出乎人们的意料，第二天报纸就把溥仪秘密会见土肥原的消息登了出来，并揭露了土肥原此行的卑鄙目的。正好，刘骥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，“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”。^③于是溥仪又踌躇起来，他同陈宝琛、郑孝胥、胡嗣瑗等商量去不去东北的问题。陈宝琛认为“当前大局未定，轻举妄动有损无益”，而郑孝胥担心“时机错过”，“等日本人把溥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80—281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81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81页。

伟扶上去，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？”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当时，一般亡清遗老，曾多表示反对，惟有郑孝胥父子，一味迎合日本侵略者的意图。与此同时，溥仪也接到不少来信来访，其中有提出忠告、警告的，甚至有劝溥仪“不要认贼作父，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”。但是，当时溥仪一心想东山再起，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正象他自己写的：“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，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。”^①

十一月四日，土肥原根据他的调查，立即拍电报给关东军，说明桑岛是根据外务省训令，监视溥仪，不让他逃脱。如果不用“特殊的手段”，很难达到目的^②。但是本庄繁鉴于黑龙江省形势呈现紧张，所以叫板垣告知土肥原，现在使用“特殊手段”为时尚早，等“黑龙江省政权安定后”，再使溥仪逃出较为妥当^③。可是，土肥原等急不可耐，为了早日挟持溥仪逃走，竟搞了一连串阴谋诡计，先是利用特务进行威吓，后是策划“天津事件”，为溥仪逃走制造烟幕。

就在溥仪离天津的前两天，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，竟在水果筐子里放了两颗炸弹。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叫喊说：“不好了！”“炸弹！两个炸弹！”溥仪一听，吓得都不能从沙发上站起来了。第二天，吉田翻译官就借口向溥仪说：“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”，“还是早些动身的好”。^④与此同时，溥仪还接到不少恐吓信，有一封只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如果你不离开这里，当心你的脑袋！”祁继忠还告诉溥仪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，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，“好象衣服里面藏有电刀”。^⑤溥仪一向认为祁继

①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。

② 《秘录土肥原贤二》，第203页。

③ 同上书。

④⑤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85页。

忠是他最喜欢的随侍之一，很受自己的宠爱。然而，他却不知道祁继忠是一个日本间谍。这些伪造的惊人消息，就是日本特务通过祁继忠干的。

土肥原为了急于把溥仪挟持到东北，竟在十一月八日晚策划了一个“天津事件”。他组织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，制造混乱局面。然后，驻天津日军司令部“立即下令警戒，占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”，^①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。然后，日本侵略者又把装甲车开到溥仪居住的静园门外，把静园控制得很严。他们怕走漏了风声，于是，一个秘密挟持溥仪的计划开始执行了。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那天傍晚，按照日本间谍祁继忠的安排，瞒过所有的耳目，把溥仪放进一个敞篷汽车的后箱里。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，那个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坐着一辆汽车悄悄跟在后面，如果遇到日本兵阻拦时，经后面的吉田一招呼，便立刻通过，偷偷地被送到一家日本饭店——敷岛料理店。他们给溥仪穿上一件日本军大衣，带上日本军帽，又坐上日军司令部的军车，来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，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早已等候在那里。溥仪上了船，“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，心里才稳定下来”。^②除了郑孝胥父子和祁继忠外，还有吉田忠太郎、上角利一、工藤忠、大谷猛等跟随监视^③。小船在十几个日本兵的押送下，一溜烟地逃到大沽口。然后，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“淡路丸”，十三日到达营口市满铁码头。关东军特派日本特务甘粕正彦（化名为内藤维一）到营口来迎接。溥仪在甘粕等人陪同下，先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，实际是被封锁

① 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，第7卷，第258页。

② 溥仪：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第288页。

③ 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101页。

起来，不准与外人接触。仅由板垣和片仓两人负责联系，委托甘粕正彦在溥仪身边负责所谓“照顾”。^①

溥仪本来是被板垣等挟持来的，但他们却撒谎说：“溥仪因天津暴动而感到自身危险，自动逃出天津，十三日十时突然在营口登陆，要求保护”。^②固然溥仪有积极卖身投靠的责任，但关东军的鼓动、怂恿，甚至武力威胁和挟持，也是事实俱在，不管怎样胡诌，也是改变不了的。

当时，国联正在开会，日本处境孤立，因而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，要求陆军大臣给关东军拍来电报（十一月十六日），其中指出：“关于拥立溥仪，过早行之，徒然刺激列国，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”。^③于是，关东军也不得不收敛一下，改变原来的想法，并于十一月十八日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，把溥仪弄到旅顺的大和旅馆，加以严密封锁，不让溥仪下楼，也不准外边人上楼。溥仪梦想到东北后，马上就能复辟清朝，可是他哪知道已经受骗上当，只不过是成了被人玩弄的一张牌。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，是要准备这张牌；以便等待时机，好把它打出去。但在未打出去之前，需要严加封锁。所以溥仪被弄到旅顺以后，和在汤岗子一样，仍然由日本特务甘粕正彦和上角等负责所谓照顾，处于被监禁的状态。

三、积极拼凑伪省政权

关东军把溥仪挟持到东北以后，没有立即扶上台，除了前面

① 《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》，第101页。

② 《满洲国史》总论，第172页。

③ 日本《现代史资料》第7卷，第267页。